



张岂之 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的力量在于使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得以传承、凝聚、提升、发展，永不衰竭。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岂之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513 - 0293 - 7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中华文化 - 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1266 号

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 者 张岂之
责任编辑 党晓绒 申亚妮
装帧设计 风 雪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 - mail: tbsybl@126. com
tbwyzbb@163. 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插 页 20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293 - 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54



我的职业是在大学教书，平时也有一些社会活动，大都是学术交流一类的事情，如参加学术研讨会，或是给青年学子们就我比较熟悉的问题谈些看法。我每次参加这类活动，事前都做准备，写有发言稿或讲演稿。当然，对于这些并非机械使用，而是视具体情况有所增减。日积月累，我做这些工作有了意外的收获，就是有时我自以为熟悉的问题，在我写发言稿、讲演稿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并不熟悉，于是重新读书、思考，直到弄懂为止。自己有了提高，兴趣也就增长起来。

我还体会到，用文字表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用语言与同行们及学生们面对面地交流，这是不同的两回事。在书房里写成的研究性文字，印刷出来成为“论文”或“文章”，不论别人是否接受，总算是自己的一份研究“成果”。可是，面对同行和学生，用语言去表达某种观点，从别人的反映里会很快检测出：有时自认为不错的“成果”，别人未必都能接受，这说明自己的研究或表述尚不够成熟，需要继续努力。

我比较喜欢用语言与同行及学生们交流。像我这样长期研究人文学术的学人来说，有时难免感到心境的寂寞，这是老年人的通病吧。排除的最好方法就是多和人交流，多给自己压担子。比如，自撰的一份讲演稿，也许会在不同场合讲两三次，但并非都是照本宣科，而是有不少的增补和删削。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我对自己学术讲演的反省极多，我称之为“自我教育”，这对于一位人文学科的教师、特别是老年教师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我还想说,近一年来我的心情很好,主要因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从事的专业性研究,其天地越来越广阔。因而我准备学术讲演的信心也随之加强。而学术讲演稿也许是最能代表学人研究心得的记录。

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向我组稿,“文艺”我没有研究过,写不出书来。编辑说,不必拘泥于文艺创作之类的专业性研究,可从比较开阔的视野去选择书题,于是就有了将自己的讲演稿选出一些,加以整理出版的念头。在我的学生陈战峰副教授、夏绍熙博士的协助下,终于编成了《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本小书。文字与图片加起来,不超过 20 万字,这样也许更加方便读者阅读。我期待着读者朋友们对这本小书的指正。

张岂之

2011 年 12 月 11 日于西安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序/张岂之 / 1

第一辑 中华文化的源头 / 1

追本溯源的意义 / 3

关于“忧患”与“和谐” / 7

从“以民为镜”到“以人为本” / 13

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理解 / 18

关于中华文化的源与流 / 23

第二辑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27

关于中国史学学派 / 29

白寿彝先生与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友谊 / 35

“修辞立其诚”与冯友兰先生文风的特征 / 42

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 / 5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特色 / 69

匡亚明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 / 72

第三辑 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 77

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 79

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 / 86

- 我读《道德经》 / 96
- 书院与文化会通 / 103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研究 / 107
- 中华文化与“和谐”理念 / 111
- 儒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117
- 我国人文学术研究展望 / 123
- 研究“浙学”的重要意义 / 127
- 孙中山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 / 131

第四辑 文化自觉与文化育人 / 139

- 关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 / 141
- 博士生导师的学术责任 / 152
- 关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文化育人 / 160
-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文化理念” / 167
- 文化传承创新与大学使命 / 170
- 清华的人文传统 / 176

附 录 / 189

- 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西安日报》记者采访)
——张岂之教授谈中国传统文化 / 191
- 张岂之：“会通”精神助推人文繁盛(《儒风大家》采访) / 196

第一辑

中华文化的源头

ZHONGHUAWENHUADEYUANTOU



· 追本溯源的意义^① ·

我有机会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感到荣幸。这是一个大家感兴趣、值得深入讨论的主题。

我谈三点看法，就教于诸位学者。

一、中华文化有源头

三十多年来关于我国炎黄文化的研究，许多学人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中华文化有源头。如果不承认文化有源头，那就等于否定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谈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承认并力求厘清文化的源头。

从20世纪初开始，我国学者们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角度去探求中华文化的源头，即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耕耘，到今天（2010年），对炎黄时代、炎帝和黄帝的历史贡献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我们知道，民族是在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不会是由一对夫妇及其后代繁

^① 2010年3月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北京举行的“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衍而成。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统一体。费孝通先生等对此作出了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追根溯源,在炎黄时代,距今 5000 多年前,中原部落的统一,国家雏形的确立,文字的初现,为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奠定了基础。我们说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有功德而受人尊敬的先贤,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

从炎黄时期开始的中华文化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巨流,有源头,有传承,有发展创新,有辉煌的未来。数十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来学者们关于炎黄时期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已经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这是我国人文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炎黄文化研究有丰硕成果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已经摆脱了个人手工业方式,不仅有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协同(如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等),而且在研究方式上已经跨越了个人狭小的书房,形成了学者群体性的研究方式。这里应提到 1991 年 5 月 10 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当时召开了以“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在其影响和带动下,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陕西、天津、上海等省、市分别成立了以“炎黄文化”“炎帝研究”“黄帝研究”命名的研究会。这些研究会对于炎黄时代和炎黄文化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我国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成为学者们的群体性的学术研究,这已经是众目共睹的事了。

近三十多年来关于炎黄时代、炎黄文化的研究成果,用“丰硕”二字来形容,并不为过,至于具体数字,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有所统计,这里从略。我只想提到这样一点,就是:关于炎黄文化,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学术工作者在哪些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 炎帝、黄帝与中华文明起源;2. 炎黄时代、炎黄文化的内涵;3. 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4. 炎黄文化与民族史研究;5. 炎黄文化研究与考古学;6. 炎黄文化与我国区域文化研究;7. 炎黄文化与我国民俗文化研究;8. 炎黄文化与中华文化认

同感研究等。以上分类未必准确,列举出来,足见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学术工作者在炎黄时代、炎黄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了很大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还有一点,就是炎黄文化的学术研究,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并将其成果列入政府所主持的文献编纂中。以我比较熟悉的陕西省来说,其首轮修志中就列入《黄帝陵志》;续修志中又有《炎帝志》,作为该省特色志书的一种,此书刚出版不久。我国其他地区类似情况很多,无需一一列举。

三、中华文化研究有灿烂前景

这不是口号,也不是空话,是基于以下两点思考。其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须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众所周知,当前我国存在着一些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有些是制度环节方面的,有些则是属于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平,即人的内在素质方面的问题,二者相互交错。如果不注意研究并采取得力措施来提高现代公民们的整体素质,制度环节上的问题也难以解决。比如关系全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法》已立法、通过,可是今天在我国市场上的食品安全仍然令人担心。一个健全的社会如果没有诚信作为思想支柱,再好的立法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法律与道德的结合,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现代公民们的整体素质和道德文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普及和深化。应当承认,在文化市场上,我国文化产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不能根据这一点便说我国现代公民已普遍接受了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

至于真正触及人们心灵的文化资源,引导人们严肃地思考人生问题,客观地说,在这一方面还存在不足,在未来的岁月要努力加以弥补。我们人文学者的责任相当重大,我们对民族优秀文化的重新诠释、普及、宣传,也许只能说开了一个好头,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目标。因此,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人文学术研究工作者来说,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在近几十年里只要身体健康,是不会“失业”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综合国力的上升,提出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中国学者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研究愈深刻,向世界传播愈得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文化的灿烂前景也是显而易见的。

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两个立足点,一个是追根溯源地研究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演进,再一个是重新诠释,进行创新,使其民族性与时代性紧密结合。这两个方面的兼顾,才能提升我们对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本次学术研讨会着重于中华文化源头研究成果的总结,有了这个台阶,便于跨入另一个台阶,这就是传承与创新。我衷心祝愿此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 关于“忧患”与“和谐”^① ·

欢迎学界朋友们到古城西安参加 2010 年清明祭陵学术研讨会。

2010 年清明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清明·感恩与社会和谐”，这便于学者们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背景发掘祭黄帝陵的感恩意蕴，进一步探讨中华文化基本理念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不忘民族忧患

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赫然在目的两个字：“忧患”，有来自自然界，也有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中华民族在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长期历史中，产生了忧患意识，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并转化为民族的实际行动，所以总能战胜困难，不断前进。众所周知，在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曾被所有世界列强所欺凌，但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征服、消灭，相反，他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一种生机，有一种永不衰竭的活力，我们称之为民族精神，而忧患意识恰恰就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

“清明”传统节日被称为“民族感恩节”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质就是不忘中华民族的忧患历史和民族奋斗史。如果离开“民族忧患”，就无法理解

^① 在 2010 年“清明·感恩与社会和谐”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民族感恩”的深刻内容；同样，离开民族的和谐理想，也难以认清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将“忧患”与“和谐”联系起来思考，是有必要的。

二、孔子的“忧”与“乐”

如果要对人的道德情操进行分类，用中华文化中的两个理念“忧”与“乐”来表述，最为恰当。忧乐观实际是价值观。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代表的孔子（约前 551—前 479），多次讲述自己的“忧”与“乐”。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作为“君子”，不注意自己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照道义的原则去行事，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孔子目睹春秋末期社会现实情况而产生的忧虑。

“忧”与“乐”相互依存，孔子有“忧”也有“乐”。他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孔子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他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坚持追求道德和学业上的进步，实在是一位贤明的君子呵！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由此可以看到，孔子区别“忧”与“乐”，其标准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状态，这在中华文化中简称为“尚德”精神。

如果认为孔子的忧患意识只从人的道德品质着眼，那就不够了。他同时关心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在《论语·季氏》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鲁国公室衰微，在鲁国掌管实权的是所谓“三桓”（鲁庄公弟庆父、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颛臾”附属于鲁国，主东蒙山祭祀，季孙氏企图讨伐颛臾。面对这种形势，孔子讲了关于社会和谐的政治哲学，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东汉经学家包咸（前 7—65）《论语章句》、南宋思想家朱熹（1130—1200）《论语集注》认为，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上下和同”“小大安宁”^①、“上下相安”^②。总归一句话，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经

①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十九《季氏》，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649 页。

②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70 页。

济实力是否充实,人力资源是否充沛,而在于对这些财物的占有和处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会安宁有序;他强调人的作用大于物的因素。“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对于执政者来说,要求他们端正、公正。后来,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着孔子的这个思路去看社会问题的。

三、忧患意识源于中华文化中的变易之学

“忧患”一词出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的作者认为《易经》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忧患之作。《易·明夷卦·彖传》举例说,殷纣王时期,天下无道,当时周文王被囚,蒙受大难,但是文王内存阳刚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化险为夷。

战国末期,学者们研究《易经》,将研究心得写成《易传》(或《易大传》)一书,共分十篇(亦名“十翼”),其中《系辞》(上、下)着重论述《易经》的理论要义。据当代学者高亨(1900-1986)先生的研究,“此两篇长文(即指《系辞》上、下),结构不甚谨严,有文句前后相重者,有文意前后相复者,又有似随意记录或简篇错乱者。”^①

高亨先生的看法值得注意。我多次研究《易传·系辞》,都感到其中似乎缺少一贯的思想,相互矛盾处颇不少见。再三推敲,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由于《易传·系辞》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众多学者研究《易经》的心得汇集,加上竹简整理的粗疏,肯定有上述的不足。尽管如此,我们提炼《易传·系辞》中的主旨思想,排除与此相悖或矛盾之处,是可以做到的。

在《易传·系辞》作者们看来,《易经》主要讲天地、人事变化的道理,这简称为“变易之学”;人们通过占卜,就会知道如何趋利避害。正如《系辞》下所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一不在变化,礼仪刑法也是如此。当事物达到极限,会发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03-504页。



生变化;变化了就能发展;发展了就能畅通;畅通了就能长久。基于此,《易传·系辞》的作者们用“生生”“日新”等来指称事物变化的过程,肯定它,赞美它。《系辞》还从历史角度阐明事物的变易之理,如黄帝、尧、舜时期的各种文明创造,给社会带来福祉,就是很好的例证。

《易传·系辞》进一步研究了事物变易的内在根源,认为阴阳、刚柔、动静、吉凶、祸福、存亡等对立方面的相推相摩,引发了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用“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八个字来说明:人们认识事物变化之奇妙,赞之为“盛德”。洞察此,君子们才能够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易传·系辞》下)。由此可以看出,《易传·系辞》的忧患意识是从事物变易之理推断而出,体现了中华古代文化中朴素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形态,当然还有其他理论形态,这在《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古籍中得到体现。总之,中华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绵延不断的辩证思维,使中华民族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正反两面,并且能够预见事物的发展方向。

以上是我们在《易传·系辞》中提炼出来的正面论述,不过,也应当看到,在同一部古籍中并非只表达一种思想,有时多种思想并存。例如在《易传》中也有认为“天”是神性的观点,并且把天、地分割成贵贱的等级(见《易传·系辞》上),同时其中也不乏神秘主义因素。因此我们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应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四、忧患意识的演变与发展

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代政治家魏徵(580-643)将“忧患”解为人的精神状态,据《新唐书·魏征传》载:“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治国理政者能够不忘国家的危险因素,从而采取预防的措施,社会有望趋向安全;能够考虑明白混乱的原因,社会才能逐渐太平;能够思考清楚灭亡的原因,社会就能变得稳固。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

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种要点。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也就看不到社会矛盾,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妥善方法,建造不了社会和谐。因此,对于治国理政者来说,即或是在非常顺利和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刻,仍然要谦虚谨慎,牢记“自强不息”这个中华文化的古训。

这里要提到大家熟知的《贞观政要》一书,该书为唐代史家吴兢(670 - 749)所著。他生活在武则天至玄宗时期,看到当时社会繁荣的景象,也觉察到社会中存在着的某些危机。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并不完全是歌功颂德之作,还含有忧患意识以及对于社会矛盾的关注,后人从中可以得到启示。

关于忧患意识,我们经常将北宋时期政治家范仲淹(989 - 1052)的《岳阳楼记》一文作为代表,要人们去诵读,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是很有见地的。

范仲淹有丰富的政治和实践经验,曾在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率军遏止西夏军的侵扰,访问过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此楼唐朝时初建,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著文以记其事。文中首叙岳阳西著名大湖洞庭景观,次叙在淫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感物而悲,再叙春和景明之际登楼览物而喜。最后问如何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回答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里提出了问题:政治家们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信念?范仲淹对此做出了明确回答:在朝廷做官,要情系黎民百姓;不在庙堂之上,仍然要有对于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和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范仲淹把我国古代的忧患意识提升到忧国、忧民的高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述忧患意识在明、清时期又有发展。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忧患情怀表现在他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上,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企图为政治革新找到一条新路。到了清代后期,人们的忧患意识又表现为民族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潮,有了崭新的内容。